

陆学艺的社会研究方法

王春光

(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研究所, 北京 100720)

[摘要] 陆学艺对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贡献是多方面的, 而国内学术界对其社会研究方法的介绍和评述并不多见。事实上, 纵观其一生的学术生涯, 他探索了多种社会研究方法并付诸实践, 这也为他认识社会提供了有效的工具。陆学艺的社会研究方法体现在多个层面: 从学术取向到实地调查方法, 再到学术研究活动的组织方式。这些层面都体现出了鲜明的特色, 即“接地气”, 嵌入到中国的社会人文深层, 不仅管用有效, 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

[关键词] 陆学艺; 学术遗产; 社会研究方法; 熟人情报网络; 团队合作

[中图分类号] C 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9162(2015)05-0005-06

所谓研究方法, 就是人们在研究过程中用于发现新事物、新现象并提出新观点、新看法、新理论, 揭示事物内在规律的手段和工具, 因此是运用智慧进行科学研究的一些技巧和策略。凡是成名的学者必有一些独特的研究方法让人们思考和借鉴。陆学艺在其一生提出的一些相当有影响的观点和论断, 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采用的一些有效的特定研究方法, 对这些方法进行适当的总结和分析, 对后辈学人会有许多助益和借鉴。

本文将方法论纳入到研究方法的讨论中, 也就是说, 从广义上总结和分析陆学艺的研究方法。

一、“选题比找对象重要”

在去世前的 2012 年 3 月 15 日, 陆学艺受邀到广州市委党校讲课, 在与该校老师交流研究心得时说道: “选题比找对象重要”。这是他对其研究方法的深刻总结。研究选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研究成果的水平, 甚至决定了一个研究者的发展前途。他认为, 一个研究者不仅要选好某个具体课题的主题, 更要选对一生的研究主题。那么, 什么样的选题才是好的、才是重要的呢? 他认为, 选题必须关注当前国家重大问题和挑战、以及关系老百姓切身

利益和需求的现象, 而不是那些无关痛痒、尽做研究消遣或好玩的事情。他曾多次列举某重要刊物发表一篇探讨一个村民进城找不到厕所而落下不良反应的文章, 认为这仅仅是个例, 不具有普遍性, 一本重量级社会学刊物竟然发表这样的文章, 不仅浪费学术资源, 而且会在学术界起到很坏的示范效用, 不利于中国社会学发展, 是一件很丢脸的事情。

怎样判定和选对选题, 不是一个简单易行的事情, 需要具备许多条件。在陆学艺看来, 这些条件至少是: 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意识; 对国家形势走向和政策的把握; 古今中外的比较视野; 对基层的了解和把握; 理论修养等等。社会责任感和意识非常重要。在陆学艺看来, 当代的中国学者必须要有社会担当和责任, 要有济世救民、强国富民的胸怀, 而不能仅仅满足于发表几篇文章、出版几部专著。这一学术态度基本上承接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只有时时刻刻想到自己的社会责任, 才会去选择利国利民、达济天下的课题。他不仅是这样想的, 而且也以行动诠释了这一态度和精神。早在中学时代, 他曾立志当个农业经济学家, 以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当时他就看到, 中国那么多农民长

[收稿日期] 2015-06-11

[基金项目] 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项目

[作者简介] 王春光 (1964—), 男, 浙江永嘉人, 社会学博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从事社会结构、社会流动和农村社会学研究

年辛劳，依然不能解决温饱问题。在大学时代，他先是学理科，后来转向哲学，但他关注的仍然是农村和农业问题，尤其是所谓的三年“自然灾荒”问题，他曾就此利用假期深入安徽调查，发现问题的症结不是天灾而是政策失误。在攻读中国哲学硕士以及后来留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以来，他也没有放弃对农村、农业的研究，特别是利用在河南“五七干校”劳动和在北京大兴搞“四清”工作的机会，更是深入观察、调查和研究农业问题。左右他行动的就是他的一种社会担当，即想解决中国人的吃饭问题。他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不解决“三农”问题，中国难以富强，更难以复兴。有了这样的社会责任以及前期的农村生活和调研，在上世纪70年代末农村改革刚刚萌动时，他就敏感地认识到，该到了为农业发展做点事的时候了，于是，他多次深入到甘肃、河南、安徽等地农村进行调查，以有力的证据证明“包产到户”的重要性，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高层对农民自发的包产到户的疑虑和犹豫。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三农”问题研究上的地位^[1]（PP. 5—8）。

他总能在关键时刻发出有说服力、有影响的声音。上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改革风生水起，农业大丰收，几亿人口的温饱问题在短短的三年内得到解决，国家将改革重点转向城镇。正是在农村形势大好、城镇改革艰难启动和推进之时，陆学艺却基于自己对农村的调查和宏观形势的分析，在许多支持改革者看来很不协调地指出，中国农业将陷入徘徊期。他的判断相关文章经历多方努力才得以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内部刊物上发表，其观点很快得到最高决策者的关注，有力地扭转和矫正了一些农业和农村政策的偏差。他不仅在“三农”问题上一直将自己的研究选题紧跟国家的发展形势，而且在其他领域，也是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大背景下，比如对住房体制、社会分层和流动、社会结构、社会建设等研究。虽然他对住房体制改革的研究诱发于一次与高层的偶然对话，但是他认为，住房问题事关国家安稳，“农民有一亩三分地，城市居民有一间房子，社会就会稳定，有恒产就会有恒心”。他说，在住房改革之前，一个单位令领导最头疼的事有两件，一件是人事安排，另一件则是分房，当然前者也与后者直接有关^[2]（PP. 298—309）。在人生最后的10年，他致力于社会建设研究，其理由是中国再也不能以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不均衡方式保持长期的稳定

和发展，社会建设能解决这个不均衡问题。总而言之，他的学术抱负就是“富民强国”，在他看来，学术的价值在于是否利国利民，而不在于你做的是哪门子学问。

由此可见，他认为，社会科学研究选题与国家形势和政策密切关联，并多次指出，在中国做社会学研究，不了解国情特别是宏观形势走向是不行的。但是，他却看到，许多所谓的社会学研究者只陶醉于自己所认定的那个有趣的范围，而不关心国家宏观形势走向和政策变化，结果只能把自己的研究视野狭窄化，脱离现实，从而影响到选题。社会学是一门应用性社会科学，学科宗旨就是要解释和揭示社会秩序是如何产生、形成、变迁和维持的。直面社会现实，在中国，国家对社会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不了解和不关注国家形势和政策，不将它们纳入到研究视野，显然会降低选题的影响力和价值。陆学艺有句名言是，做学问，要“吃透两头”，两头中的一头就是国家的政策，另一头就是基层。他还经常说，要“顶天立地”，也是这个意思。确实，这给中国社会学研究提出了一个严肃而重大的学术命题，就是如何研究国家政策及其社会影响。

决定好选题的因素是多样的，中外古今比较视角、跨学科知识、平时的理论训练和研究锻炼等，在陆学艺先生看来，也是很重要的因素。如果说社会责任是引领性的，那么其他因素都是基础性的。只具备基础性的因素，还不足以确定其选题是重要的、有价值的，必须辅之以社会责任和担当。陆学艺认为，在当今功利主义畅行、物欲横流的时代，学人更需要社会责任和担当，才能确立重要的有价值的选题，才能做出对国家、社会和人类有意义的研究。

二、“真学问在下面”

陆学艺非常重视对社会实践、基层社会的调查研究。他长期深入基层调查，养成了到一地就调查的习惯，他经常说，只有深入调查，才能真正了解当前社会存在什么样的问题、难点、疑点和热点，然后才能确立自己的研究对象和问题。他说：“社会学工作者要勇于敢于研究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难点、疑点和热点问题，要深入到实践中去，用社会学特有的视角和方法，去调查研究，去总结经验，了解新情况，发现新问题，并认真研究这些问题，分析这些问题产生的原因，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方

案和对策。这样的研究才有成效，这样的成果才有重大现实意义，也才有较高的学术价值。”^[2] (P274) 因此，每到一处，他都会提出调查要求。经常有人邀请他去做学术报告，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先决条件，那就是让他先调查几天，然后再做报告。对于这样的条件，他自己是这样解释的：人家请他做学术报告，是想听到一些对他们实际工作有价值的观点、建议，而如果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怎么能说出对他们有启发的东西呢？他的演讲都会结合先前的调查展开，所以他的每次演讲都会赢得听众的高度评价。他真心地认为，“真学问在下面”，所谓的“下面”，就是社会现实或实践，更通俗地说，就是蕴藏在百姓中。因此，他每次都很注意同百姓聊天或访谈。尤其是到农村，见到农民，他就来劲，精神抖擞，掏出笔记，与农民边谈边记，记得还非常详细。他说他的几乎所有观点都是在基层调查研究中获得和形成的，所以他的“真学问在下面”就是他长期的学术实践的总结和提炼。

陆学艺在进入社会学界之前就非常注重深入基层调查研究，以至于农业经济界的一些同仁都感叹陆学艺在研究方法和关注点上的特长。国务院农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怀念陆学艺的讲话中就重点指出，陆学艺研究农业，与其他经济学家不同，他不只是见物，而且更注重人，尤其重视农民的想法、需求和困难。陈锡文认为，经济学研究见物不见人，而陆学艺既见物又见人，而且更重视人。上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他深入农村，与农民交谈时记下的不少文字资料都是他分析农业问题时非常重要的依据。虽然那时他还不是社会学家，对社会学是什么还不是很了解，但他无疑是采用了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从而会呈现出与其他农业经济学专家不同的研究风格和视野。不同理念决定了采用什么样的研究方法，反过来不同的研究方法也会影响研究视野以及如何向“下面”学到“真学问”。据跟随他二十多年做研究的经历，笔者对他的研究方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和分类，他基本上是采用深度访谈、部门座谈、实地观察、熟人情报网络、长期跟踪调查等研究方法向“下面”学“真学问”。

陆学艺在深度访谈上有一个独特的窍门，那就是他不是随便找个对象就进行深度访谈，而是找“明白人”（在社会学上叫“关键人物”）访谈。他认为，并不是所有人都是“明白人”。比如，在一个村里，不是所有人都是“明白人”，但总有几个

会是这样的人。对“明白人”的深度访谈获得的信息会远远多于对其他非“明白人”访谈获得的。一个村总有几个“明白人”，只要找到他们并与他们进行深度访谈，就会在有限的时间内获得对该村的深入了解。如果碰上糊涂人，一问三不知，那就会无功而返，不断浪费时间，根本了解不到该村情况。陆学艺有一套很有效的访谈技巧，会使调查对象不但不会拒绝，而且会在很短时间内建立信任，因为信任对调查来说有着非常关键的作用。由于长期与农民打交道，因此，他一见面，就能说一些农民关心的事，说的话都是农民能听得懂的，在行为上没有架势，很容易被农民视为懂农业、农村和农民的教授，农民也就愿意跟他交谈。随着交谈的深入，他慢慢地会从被当作懂农业和农村的教授转变成被当作农民说话的“自己人”。这一环一环的转变，无疑会提升深度访谈的水平和质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有质量的深度访谈需要各种各样的技巧、能力和态度：要有一种平易近人的态度和表现；能够说让调查对象理解的话语；在访谈中拉近关系，实现角色转变；让访谈对象也能获益等。要做到这些，并不是容易的事，特别是对初入调查之门的新手来说更难。

部门座谈是陆学艺经常采用的调查研究方法。每次去调研，他都会找政府有关部门去了解当地政策以及其他社会经济情况。早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去山东陵县兼职的时候，就发动同去的同事对陵县所有政府部门和乡镇政府开展地毯式的调查，收集到大量的资料，为他后来的学术研究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和材料。他经常说，陵县的兼职使他真正了解到中国县乡行政和社会的运行机制和规律，他还不时劝导年轻的社会科学研究者有机会下到县乡挂职锻炼，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接触到和了解到中国的基层现实，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将自己的研究建立在更扎实的对基层的理解上。他每次做调查的目的虽然都有所不同，但是，对政府的农业部门、财政部门、发改部门、研究室等这些在他看来很重要的部门是必须调查的。他的部门座谈方式也很有特色：一般来说，一个部门出席座谈的都是主要领导，他会先介绍自己的调查目的，然后要求部门领导抛开稿子介绍情况，接着他会与他们进行深入交流，尤其会就如何做好相关部门的工作进行讨论，比如对农业部门，会就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进行交流，会介绍其他地方一些有益的做法并给出自己的一些意见。这种方式很受部门领导的青睐和赞

许，他们会把陆学艺当作给他们出点子的大学者，对他有更多的信任，往往会在座谈会后给予更热情的接待，将更多的内情告诉陆学艺，会带陆学艺去看他想看的東西。所以，通过这样的部门座谈，陆学艺往往会获得许多调查者在部门所难以获得的信息、材料和数据，获得轻易不对外开放的档案资料，就更能了解事实真相，有效地解决部门对待调查的形式主义问题。

“百闻不如一见”。陆学艺在每次调查中不仅要问、要听，更愿意去看。记得2009年，他去贵州调查，那是他第一次到贵州，他非得要求进村了解、观察。他认为，仅仅听介绍是不够的，心里不踏实。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看出问题来的，这叫“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显然，陆学艺是行家里手，他是带着问题去看，与此同时，他心里还有许多参照体系，会将当下看到的与以前看到的作比较、比配。比如他经常说，到农村去，首先看房子，如果一个村里最近几年没有建新房子，那么这个村可能会是一个穷村，因为绝大部分中国农民一旦有点钱，首先会去修建新房子，或为儿子，或为自己的面子。他还举例说，有一次他去美国中西部考察，发现美国农民居住很分散，他就想了解美国农村基层究竟是怎样管理的？有没有像中国农村那样的或类似的村委会组织？结果他发现没有这样的组织，而教会在基层社会治理中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于是他就反思中国农村基层社会该如何治理，可惜他最后来不及去探讨这个问题。总而言之，不论是在国内调查，还是到国外访问，他都非常重视去实地参观，去观察当地的社会、经济和文化现象，目的是寻找中国社会的运行轨迹和发展方向。

陆学艺经常引以为傲的是在全国各地有一批志同道合合并经常为他提供研究情报的朋友，我将此概括为他的一种独特研究方法，称之为“熟人情报网络”。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熟人都能进入这个网络，要进入这个网络的人需要具备一些条件：对当地非常了解，可以说是“地方通”；其次，对调查研究有很强的兴趣，甚至都是地方的笔杆子、研究者和决策智囊；有频繁的来往、交流和沟通。陆学艺经常对笔者说，到全国各地调查，要去挖掘这样的“线人”，与他们交朋友，这样就可以随时掌握各地的情况，尤其是现在变化那么快，他们都会成为我们了解现实的重要桥梁。他每年都能比农业部和国家统计局更准确地预测中国农业形势，就得益于他随时能从分布在东南西北的朋友那里了解到当地农

业的真实情况，然后辅之以对全国天气情况和市场价格的了解，就可以提前几个月把握住农业生产情况，尤其是粮食产量情况。他说，他的好多想法和看法都得益于与这些关键“线人”的交流。

长期跟踪调查是陆学艺的又一重要的具体举措和研究方法。他上世纪60年代在农村搞“四清”时就开始有意识地建立自己的调查研究站点和基地，比如大兴的调查点；1983年至1986年，他到山东陵县挂职县委副书记，那里成了他又一个调查研究基地。后来陆续在江苏太仓、福建晋江、湖北荆门、四川成都、贵州贵阳、浙江温州等地建立了长期开展跟踪调查的基地。他上世纪80年代末倡导以县为单位的国情调查，就更加注意建设调查基地。他认为，中国地域很广，各地差异很大，不在全国设立一些长期调查的基地和点，仅仅靠短暂的一次性调查不足以把握中国各地发展的脉络和轨迹。他认为，县域是研究中国国情的最佳范围，因为县政府是国家的缩影，与此同时，一个县有自己相对独立、完整的社会、经济和文化体系。因此，在县这个层级开展长期的跟踪调查，就能系统、完整地把握国家的基层社会经济运行脉络。确实，他的许多研究无不与在这些调查基地开展长期跟踪调查研究有关。除了百县研究成果外，他还主持撰写了太仓、晋江等县市的研究专著，在社会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好的影响。

总而言之，陆学艺是一个扎根实践、深接地气的大学者，他的思想、智慧源自于“下面”，而且也真的在为“下面”做学问。为了“下面”的利益和福祉，秉公直言，不怕得罪高官达人。他建构和采用了一套有效的、融合中国文化元素的调查研究方法，在社会学和社会学研究中注入了中国营养液，将学者的研究关注点引向“下面”，从“下面”寻找和探索真学问。

三、仅靠统计数据是不够的

陆学艺不仅注重深入的接地气的定性调查，而且也非常重视统计数据。每年，他最先买到国家统计局出版的统计摘要，每到一地他也很注意收集当地的统计年鉴或统计数据，在他的脑子里不断收藏一些重要数据并随时都能准确说出许多统计数据，比如人口数据、就业数据、GDP数据等。他博闻强记，对数据的记忆到了过眼不忘的程度。但是，陆学艺认为，搞研究、做学问，仅仅靠统计数据是不够的。他曾在县里挂职当过书记，长期在“下

面”做调研，更有那么大的熟人情报网络和长期跟踪调查的基地，他非常了解统计数据中存在的问题。记得有一次，他发现国家有关部门公布的粮食增产数据不对，认为增产幅度被人为压低了，因为他刚刚从东北某省调查回来，那里当年实际增产的粮食数量远远高于国家公布的数量。他于是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是不是与政绩考核或者农业政策有关系呢？这就进一步激发去进行调查研究。从这个实例中，他认为不了解统计数据是不行的，但是仅仅靠统计数据作出研究结论也是很危险的，必须要对统计数据进行深度的分析和反思。

陆学艺对问卷调查也非常重视。1998年，他主持中国社会阶层课题研究，由于经费的限制，刚开始计划在全国几个百县调查点做问卷调查，而我们几个年轻人提出，如果不做全国问卷抽样调查，只在几个县做问卷调查的话，就缺乏代表性。他采纳了我们的建议，让我们就考虑在全国做问卷抽样调查的事，钱由他去想办法。后来我们真的做成了6000多份全国问卷抽样调查，为我们撰写有关中国十大社会阶层的专著和文章提供了坚实的数据支持。从这次调查中，他虽然也发现了问卷调查自身的问题，但是，他非常看重问卷调查的价值。当然，在解读数据的时候，他不断提醒和矫正我们，数据是死的，仅仅靠数据是有缺陷的，会产生误导。除了全国抽样问卷调查外，我们做了东中西6个县市的调查，收集了11000多份调查样本。在西部一个县的问卷调查显示，该县收入最低的10%人口人均年收入只有240多元^[3]（PP. 1-10）。他认为这个数据不真实，认为再怎么穷，也不至于只有这么一点收入，否则这些人怎么生存？由于笔者参与了入户调查，知道那个地方确实很穷，2000年依然还有不少人吃不饱饭，他凭经验还是认为不可能。尽管我们之间有分歧，但是像他一样，对数据的合理质疑是每个学者应具备的品质。事实上，在调查收入问题上，目前确实也没有找到有效的手段和方法，有的收入调查数据确实存在偏差。

那么，如何使用统计数据和调查数据呢？他找到了许多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方法。一种方法是历史比较和矫正，他在查看国家统计局年鉴的过程中发现，1999年和2000年城镇化率以不正常的比例增长，于是他提出疑问，后来发现是统计口径变化导致的。比如，以前是以户籍人口为城镇化口径，后来改为以居住半年以上的常住人口为城镇化口径，这一变化使得当年的城镇化率比上年高出10

多个百分点，显然是不正常的现象。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不正常？这就是他要探讨和分析的问题。另一种办法是用具体的案例调查来检查统计数据的准确性。正如上面所说，他对有一年国家公布的粮食增长产生怀疑，于是他便去调查那几个产粮大省当年的粮食增产情况，结果发现他的怀疑是合理的。当然，所有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都不能完全满足研究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他就自然地应用了向“下面”学习的调查研究方法，不断地收集、积累各种地方知识和材料。在这个基础上，他不仅能快速地判断出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的准确性，而且还能熟练地解读数据背后的涵义，得出有说服力的看法和结论。总之，数据是静态的、“死”的，机械地使用数据不是科学的做法。

四、社会科学研究不可“单兵作战”

陆学艺一直认为，社会科学尤其是社会学研究，跟文学、哲学、历史等人文科学不同，不能单兵作战，需要形成团队合作的力量，只有团队合作，才能获得一加一大于二的效应。他主持的重大项目几乎都是以团队的方式展开的，确实收到了巨大的效用。第一个大型合作项目就是中国百县社会经济调查研究，该项目动员全国各地科研院校几百人参与，历时十多年，撰写出版了116部专著，可以说在中国学术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一系列专著成为国内外研究中国所必需参考的文献。按他的说法，百县调查不仅产生和出版了这么多学术成果，而且培养了大批研究人才，其中不少人成为全国知名学者。百县调查研究完成后，他又承接了中国百村社会经济调查研究，这个项目目前还在进行中，它延续的还是百县调查的团队合作传统。

中国社会阶层研究项目也是一个集体合作的项目。该项目于1998年立项，召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一批中青年研究者，并动用了百县调查所形成的调查研究网络，花有限的经费，完成了17000多份问卷调查，先后撰写和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2002）、《当代中国社会流动》（2004）和《当代中国社会结构》（2010）三本有较大影响的学术专著，其中《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影响尤其巨大。同样，在这样的团队合作中，一批中青年学者得到锻炼和培养。他经常称这些人为“大工”，因为他后来又对社会建设开展了团队合作研究，招募了不少更年轻的学者乃至学生参与研究，这些更年轻的研究者被他称为“小

工”。他就用“大工”带“小工”的方式继续其团队合作，直至其生命的最后。

基于对陆学艺领导的研究团队的合作实践的观察和分析，我们发现，一个有效合作的研究团队需要具备这样一些基本条件：首先，团队的统领者不仅要有学术权威，而且还具有公正无私的人格魅力。陆学艺经常说到，如果他不投入那么多精力去领导团队搞研究，自己埋头写书，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其价值就没有那么大了。一个统领者带领一个团队，不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是实现大家的“共赢”。确实，在陆学艺的团队合作中，几乎所有人都获得了明显的进步。其次，研究团队的合作需要有一个大家认可的学术理想或追求，也就是说，大家认可他们所从事的研究主题或问题既具有学术前沿价值，又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陆学艺所选定的所有合作课题在当时都具有明显的前沿性和时代应用性，如百县调查和百村调查对于认识中国国情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社会阶层和社会建设研究是当代中国最热门、最前沿的课题，所以吸引了中青年学者的关注和兴趣。再次，研究团队内部形成平等的学术交流机制，在学术互动中不分年龄和地

位，大家都是平等地参与讨论、争论，破除了行政等级和家长作风，由此才能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学术想象力。最后，学术成果共享，除了集体合作写作外，每个成员都可以发挥自己的特长去撰写自己的论文和专著。古今中外，学术团队的产生和保持并不容易，特别在中国，历来有“文人相轻”的习惯和传统，其难度更不必说了。

陆学艺在学术上的影响，不仅仅表现为发表的文章、出版的专著以及让决策层所肯定的观点，而且还给我们留下了很有价值的社会研究方法遗产，而后一点往往被人们所忽视。基于长期师从于陆学艺并参与他领导的研究团队，笔者从他那里学到了如何搞调查做学问的一些研究方法。虽然，不能说这里已经全面地分析了他的研究方法，但是，本文所讨论和提炼的这些方法无疑是其经常使用并对我们来说依然是有价值的。陆学艺的社会研究方法是其长期学术实践的结晶，是他的学术精华之一。其特点是“接地气”，嵌入到中国的社会人文深层，不仅管用有效，更重要的是探索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路径。

[参考文献]

- [1] 陆学艺. “三农”续论 [M]. 重庆: 重庆出版集团, 2013.
[2] 陆学艺. 陆学艺文集 [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

- 社, 2005.
[3]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M].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Lu Xueyi's Academic Heritage: Th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WANG Chun-guang

(Institute of Soci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720, PRC)

[Abstract] Lu Xueyi's contributions to Chinese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lie in many aspects and his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will be introduced and summarized in this paper. In his academic life, many kinds of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have been explored and put into practice, and these methods have become important tools for him to get to know the society. However, the scholar circles have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to his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From scholar interests to filed survey, then to the way of organizing scholar activities, Lu Xueyi's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show the distinctive characteristics that conforms to the reality. These characteristics embedded into the society and humanity are not only useful to better understand the society, but is a developing way to Chinese sociology.

[Key words] Lu Xueyi; academic heritage; social research methods; information net among the acquaintances; team corporation

(责任编辑 岳天明/校对 正圭)